

1916

21

第十一辑

茂名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编

89

茂名文史



茂名政协在深圳召开征集海外史料座谈会

1988年11月26日，茂名市政协在深圳召开座谈会，邀请居港茂名籍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共同研究征集港澳台、华侨史料，以及征集茂名地区的文史资料问题。香港应邀出席座谈会的有全国政协委员、文史专员、海外史料征集组副组长、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李以勋先生，广东省政协委员、香岛中学校监、原香岛中学校长李达龙先生，香港高雷同乡会副会长、《高雷文献》主编吴照业先生、副主编黄思伯先生。我市参加座谈的有：政协主席李远雄、副主席季儒彬、吴兆奇，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施巩秋、库流长、莫常振等。

吴兆奇副主席主持座谈会。他简要地说明这次座谈会的目的是促进在港、澳、台知名人士中征集海内外文史资料工作的开展，为后代留下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让文史工作更好地为祖国的大团结、大统一、大振兴服务。会上，施巩秋同志介绍了《茂名文史》所走过的历程和今后的打算。她说，由于市政协领导对文史工作的重视及所有关心文史工作的人士的共同努力，自1983年开展工作五年多来，共征集到史料120多万字，已出版了《茂名文史》九辑和出版了一批专题史料。去年11月还举行了一次有两广史学家参加的凌十八史料研讨会。《茂名文史》可谓是花开灿烂，万紫千红的。但是过去邀请港澳台及海外乡亲帮助征集史料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很不够，今后一定要把这项工作认真做好。现在请各位老先生的援助，必会有更可观的成绩。

参加这次座谈会的多数是初次相识，但是一见如故，谈笑风生。留港几位老先生都是古稀之年，但毫无倦容，热情开朗，将征集史料议题寓于共叙家乡史话之中。因此，座谈会从始至终洋溢着轻松、愉快、融洽、友谊的气氛。李以勋老先生在发言中说，开展文史工作是周总理的号召。这一号召，为中央、地方史料的收集、存史铺平了道路。茂名政协采用这种座谈会的形式收集史料，这是振兴桑梓史业的很好步骤，我们也是抱着这个愿望来的。他表示要努力将亲见、亲闻、亲身经历的史料整理，启迪后代。与会的各位老先生就如何搞好茂名的地方史工作，办好《茂名文史》提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同时，也谈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及线索，并一致表示为搞好家乡史料工作，尽力做联络、收集及亲自撰稿工作。

最后，李远雄主席讲话。他说：茂名地区有十多万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我们要充分发挥这个优势，开拓、振兴茂名地方史业。这次座谈会仅仅是个开端，从大家的发言中体现出对我们工作的热心支持，使我们对开展文史工作充满信心和希望。殷切期望诸老先生继续关注、支持我们这一工作。

吴兆奇副主席即席吟成七绝《致诸老》一诗，各位老先生兴致勃勃，俱表示返港后鸿足酬和。

（本文由茂名市政协办公室秘书科副科长梁桂整理，曾刊登在《广东文史通讯》1988年第十二期。）

茂名文史第十一辑

主 编 施巩秋
副 主 编 莫常振 库流长
编 辑 何德宏 黄景波
邓 寿 傅应权
本期校对 何德宏 李 迁

编 辑 出 版：茂名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印 刷：茂名石油工业公司印刷厂
出 版 日 期：一九八九年十月一日
广东省非营利性出版物准印证89粤印准字第112号

致 诸 老

吴兆奇

1988年11月26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假座深圳市
兴华楼，邀请旅港茂名籍数位老先生座谈文史资料征集事宜，
即席吟成七绝一首，讨教于诸老。

风尘耆宿聚兴华，
鉴水香江本一家。
盛事喜谈修轶史，
丹楹犹待几枝花。

和吴兆奇先生《致诸老》

奉和《致诸老》就正于吴会长

李发文

李述龙

星星白发慨年华，
老去还邀拟作家。
惭愧前人遗轶史，
文章未许笔生花。

十年探索振中华，
开放争鸣纳百家；
改革毋忘发展史，
眷回乐见绽奇花。

吴熙业致吴兆奇信并附和诗二首

兆奇先生台鉴：

茂市识荆，深区再叙，幸何如之。台端乃书道名家，诗坛俊彦，业也不才，谬承款接，感愧莫名。别后想已安返任所，再膺繁剧矣。

回顾兴华楼中，台端以八斗之才，成七步之诗，业以年近八旬，诗思艰涩，未及即时奉和。返舍后，心情稍定，爰步原韵，勉成二首，寄呈斧正。公余之暇，仍乞赐教为幸。专此敬颂政祺。

其一

文人雅士荟兴华，
茂港联欢合一家。
阔论高谈皆往事，
群贤妙笔定生花。

其二

高州文物耀中华，
茂市油光照万家。
今日座谈他日史，
乡情到处尽开花。

注：“高州”系指过去高州府。

吴熙业谨上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于香港元朗寓次

奉和吴兆奇

副主席两首

李以匡

(一)

关山喜越会兴华，
忝属高凉系一家。
轶事兴衰知信史，
董狐犹在笔生花。

(二)

耆英云集著风华，
谁作春秋亦史家。
鉴水滔滔多俊彦，
缅茄一树胜香花。

——转载自《茂名乡情》1989第二十二和二十三期。

(吴兆奇是茂名市政协副主席、茂名海外联谊会会长。)

目 录

中国优秀农业科学家丁颖教授·····	任 凡 (1)
信宜籍的同盟会员·····	陈启著 (4)
高州风云录·····	陈 兴 (14)
高州籍将军简介——北伐、抗日战争时期·····	李以助 (20)
“一二八”抗日淞沪战役亲历记·····	李以助 (26)
记孙中山的忠实卫士李东英·····	李以楷 (30)
久不见 长相忆·····	沈丽坤 (32)
往事依稀忆华公·····	何茂先 (35)
✓ 敦·李孝式爵士·····	冯廷泉 (36)
陈沛将军与三次长沙大捷·····	陈燕茂 (39)
第四次长沙会战中的梁汉明将军·····	陈燕茂 (47)
许国锋与“圣殿看操”事件·····	邓文威 (50)
乡心 (诗) ·····	义 一 (52)
邓龙光与秀川图书馆·····	朱仁中 (53)
高力士史料·····	卢 宁 (55)
苏轼为冼庙作“铭志”诗·····	陈红胜 (59)
举人黄羲轶事·····	李发文 (60)
信宜移民概况·····	赖德荣 (61)
古代茂名的瑶人·····	陈水润 (64)

中国优秀农业科学家丁颖教授

任 凡



丁颖教授铜像

丁颖字竹铭，一八八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清光绪十四年农历十月二十二日）诞生在广东省高州县（原茂名县）谢鸡乡石塘村一个农民家庭。他生前是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华南农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全国科协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曾被授予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通讯院士、东德农业科学院通讯院士、和捷克斯洛伐克农业科学院名誉院士等称号。他毕生从事高等农业教育和稻作科学研究，不但桃李满天下，而且在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及其演变、稻科分类、稻作区域划分、水稻的系统发育理论、选育良种以及对水稻品种进行光、温生态等方面的研究取得卓越的科研成果，他的水稻“千粒穗”科研成果闻名于世，他一生的科学论著共一百四十余篇，为新中国的稻作生产和科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

自一九一二年十二月间，他三次东渡日本留学。立志致力“民生”，决心要使“吃穷吃不尽的中国农民开始与现代科学发展联系”。一九二四年，他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业部毕业回国以后，在中山大学农学院任教。他曾四处奔走呼吁，请求政府增加农业基本建设和农业科研投资，以解决广东稻作生产、水利、肥料、品种和提高栽培技术问题。但到处碰壁、求援无门，只好调整研究方向，把主要精力放在选育稻种工作上。一九二六年，他用野生稻与农家品种杂交育成“中山一号”，是世界上首次把野生稻成功的转移于栽培品种。目前，闽、粤晚造大面积栽培的“包胎矮”等就是用这个品种经过

系统选育而成，历五十年而不衰。一九二七年，他首先在茂名县公馆墟边购买土地，建造简易工房，成立“中山大学南路稻作育种场”。他亲自担任育种场主任，和两名技术员、七名工友一起，不避寒暑、不顾劳累地工作。在六十亩长年干旱的“望天田”中开展了以选育水稻良种为主，包括施肥、灌溉、绿肥、防治病虫害和气象观测等多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随后，他又在广东省其他地区共建五个稻作试验场。总场设在广州石牌。经过多年辛勤劳动，终于选育成功六十多个水稻良种。农民们都亲切地称他为“谷种佬”，成为华南采用现代科学技术选育水稻良种的第一人。一九三六年，他又用印度野生稻与广东栽培稻杂交，获得世界第一株“千粒穗”类型，（共结一千四百多粒），曾轰动东南亚稻作科学界。他经过几十年的试验研究，认定中国栽培稻种并非自外国传入，而是起源于华南热带亚热带地区。他对稻种系统分类，对全国稻作区域划分，以及所创立的“水稻品种多型性”等学术观点，至今仍为我国稻作生产和科研所沿用。他晚年组织全国十二个科研机构分别在全国六大稻作带、八省区的十个点上，进行对一百六十一个水稻品种光温生态方面研究，尽管是一项未竟的试验，但已经为我国科研和生产发展提供一定理论根据。

丁颖教授一生正直朴实、治学严谨，他常教导于女们说：“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要求于女们不要去追求物质享受、虚掷光阴。他对于女们说：“我从来不把你们当作私有财产，而是把你们看成我的学生。我迟早要将你们交给社会，归还国家的！”在抗美援朝时，他根力鼓励子女参军，参干，保家卫国。据他家乡故里人反映：“十二公（他排行十二）见到钱不是弯腰去拣，而是一脚踢开。”他的学生们写文章称颂他是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一代良师。

他编写教学讲义时，经常去向农民请教。后来，和许多农民中的先进模范结为知己。解放前，他是中山大学仅有的两个“穿唐装”名教授之一。解放后，他成为中外闻名的科学家，仍以布衣淡食为荣。他到各地考察，总是首先脱了鞋袜下田，有时当地领导怕他年老受凉，劝他不要下水，让别人把稻株和泥土取样拿到田埂上观察。他笑着说：“不下田亲自踩一踩，就不知道土质到底怎么样？”又有一次看入了迷，伸手去摸禾苗时，不知不觉地把脚也伸进水田里去，布鞋湿透，自己还不知道。

丁颖教授一生为科学，为教育，呕心沥血，死而后已。他十分珍惜时间，从不浪费一分一秒，既无星期天，也没有节日地日夜忘我劳动。为了争取做更多的工作，他总是想方设法压缩睡眠和休息时间。他不止一次的说：“睡眠占去一个人生命将近三分之一的时间，太可惜了。”一九六四年五月，他带病连续到宁夏、甘肃、山西、陕西、新疆考察三个月。八月份又赶回北京参加有十多个国家的专家们到会的科学讨论会，在会上做了水稻光、温生态学水报告。会后就病倒了。他

在北京病情稍好，又跑到山东临沂盐碱地去考察，并做学术报告。因病情恶化，被送回北京医院，十月十四日，他因肝癌晚期，医治无效，与世长辞，终年七十六岁。经过周恩来总理签阅的首都各界对丁颖教授的悼词说：“丁颖同志一生充分表现一个又红又专的科学家高尚品德，为我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作者和农业教育工作者树立了光辉榜样。”国外许多水稻专家也纷纷发来唁电，深切哀悼这位杰出的农业科学家。

为纪念丁颖教授，鼓励后代继承发扬他的献身精神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作风，华南农业大学自一九八四年起创立丁颖科学基金会，长期奖励和表彰在农业科学教育和学习农业科学技术中取得优异成绩的教育工作者与学生。一九八八年，华南农业大学举行建校三十六周年暨纪念丁颖教授诞辰一百周年时，在校园内隆重举行丁颖教授铜像揭幕仪式。农业部何康部长题字。相重扬副部长、广东省委郭荣昌副书记、华南农业大学卢永根校长为铜像揭幕。这座高二点五米的半身铜像由广州美术学院老师们创作，广州精密仪器厂铸造。

丁颖教授德高望重，学术造诣专深。谆谆善诱，诲人不倦，不断引导学生学农、爱农、堪称一代名师。他严于律己、坚持真理、承袭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美德。为后人树立了好榜样，也为茂名史册留下光辉一页。

本文承华南农业大学宣传部梁深洪副部长协助、提供资料，特此致谢！

（题头书法：吴兆奇）

（任凡原名施巩秋，曾任茂名石油工业公司研究所书记兼所长，现已离休）



信宜籍的同盟会员

陈启著

《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签订以后，随着政府一天天腐败，民族资产阶级的爱国运动和社会政治运动也日益兴起，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代表人物孙中山于1894年11月在檀香山创立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次年，又在香港建立香港兴中会。随后，华兴会和光复会等反清革命团体相继组成。宣传革命的刊物大量出现，革命思想广为传播。至1905年8月，在孙中山倡议下，以兴中会和华兴会为基础，联合光复会成员，在日本东京组成中国同盟会，选举孙中山为总理。确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革命纲领，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在国内外各地建立同盟会支部和分会。创办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宣传革命，同改良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革命浪潮波及全国。

信宜虽地处粤西山区，但因一批青年先启考入广东高等学堂、两广方言学堂、广东法政学堂、广东警察学堂、黄甫武备学堂、陆军速成、虎门讲武堂等处学习。他们在那里认识了胡汉民、朱执信、古应芬、赵声、潘达微等一批老同盟会会员，并由这些老同盟会会员介绍，一批思想倾向革命的青年学生，陆续参加了同盟会。其中比较主要的有林云陔、林树巍、陆任宇、陆志云、梁树熊、陆耀文、陆匡文、陆幼刚、李怀霜、甘熙初、陆杰民、李拔萃、梁卫平、梁禹平、梁达、陆嗣曾、林伯虎、李卓立、梁源记、梁若谷、罗辉堃、李锡颐、李肖翰等人。这些信宜籍的同盟会员，追随孙中山革命，从中国同盟会成立起至孙中山逝世止的20年间，分别参加了“钦廉上思起义”（又称“戊申马笃山之役”）、庚戌“广州新军起义”、辛亥“黄花岗之役”、辛亥革命、讨袁运动和讨伐陈炯明战争等。有的后来还成为孙中山身边的重要工作人员。他们在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的重大事件和关键问题上，坚持不懈，作出了历史贡献。他们在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主要有五方面：1、领导高州起义成功；2、讨袁运动中，组织领导南路地区讨袁倒龙运动；3、陈炯明叛变时，冒死救护孙中山脱险；4、讨伐陈炯明叛军战争中，切实做好后勤工作，保证讨贼军的军需供给；5、坚定地作为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大造舆论。现分述于下：

光复高州的领导核心

领导光复高州是林云陔。

高州光复之前，林云陔从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做了一系列准备工作，为武装起义光复高州打下了良好基础。

1904年，林云陔和李卓立在高州学习时，组织了“新高同志社”进步团体，冒着生命危险从广州湾（今湛江）购买清朝政府禁书《黄帝魂》、《革命军》、《警世钟》、《浙江潮》、《二十世纪之支那》等进步、革命书报，组织青年秘密传阅。1908年，陆匡文等人在高州崇实中学读书时，又组织“雄辩学社”进步团体。“新高同志社”的信宜籍青年均参加这个组织，除组织青年阅读上述革命书报外，还购买《民报》、《民立报》秘密传阅。同时，定期讲演，广为传播革命思想，提高青年爱国思想，团结革命力量。从思想上、革命舆论上为高州起义作了大量的有效的准备工作。

1906年，林云陔与林伯虎、陆嗣曾、李拔萃、陆幼刚等分别考入广东高等学堂、两广方言学堂、广东警察学堂、广东法政学堂、陆军小学堂等校读书，林树巍、甘照初等入陆军速成学堂学习。他们在那里先后加入同盟会，并保持与设在高州的“新高同志社”、“雄辩学社”密切联系，还介绍这两个团体的进步青年加入中国同盟会。这些同盟会员成为辛亥革命高州起义的主要骨干。为光复高州作了严密的有效的组织上的准备工作。

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前夕，林云陔、李拔萃、陆嗣曾等人奉朱执信、赵声之命，从广州赶赴高州进行活动，组织响应“广州新军起义”的军事行动——武装起义。1910年元旦，林云陔等人回到信宜县城（今镇隆镇），通过同盟会员陆匡文召集信宜的同盟会员于莲花庵（今镇隆镇北畔村）举行会议，具体研究发动武装起义计划和介工组织实施起义计划的方法措施。后因“广州新军起义”提前行动失败，便暂停起义准备工作。随即根据参加了“广州新军起义”后从广州回来的林树巍所传达朱执信的意见，继续做好发展同盟会员工作，进一步扩大革命力量。在信宜设中国同盟会南方支部信宜分会，要求加入同盟会的日益增加。在大力发展同盟会员的同时，加紧组织武装力量的准备工作。短短时间内，信宜同盟分会便成为南路地区一个重要的革命组织和主要力量。

不久，林云陔接朱执信通知，回广州参予准备第二次广州起义“黄花岗之役”的具体工作。信宜组织武装力量的领导工作交由林树巍负责。林云陔在广州租双门底王家巷“詹同文笔店”后屋居住，暗中作储藏转运枪炮弹药的机关，大量购买武器。朱执信在“黄花岗之役”中，在进攻广东督署时受伤，撤退到林云陔处隐藏和救护，住了三夜，后林云陔给他化妆，秘密护送撤离广州赴香港。

“黄花岗之役”失败后，斗争形势十分紧张，清朝政府加强防范，加上广东各地土匪又很猖獗，各处官绅急请清政府派兵前去清剿。两广总督张鸣岐受到“广州新军起义”和“黄花岗之役”两次打击后，既害怕新军再次起义，又各怕各地盗匪附和革命，于是决定派新军远离广州，企图达到既可清剿土匪，又防止

新军再次起义的一箭双雕的目的，便派广东陆军小学总办黄士龙任高州清乡总办，他率两个营驻防信宜，在县城郊区农村瓜棚为营地，进行军事训练。林树巍、陆匡文接林云陔通知，利用这个新动向多做新军下级军官和士兵工作。一方面积极购进枪弹，另一方面到新军中秘密发展同盟会员，作新军起义的准备工作。后被黄士龙发觉，不能按预定计划实施。接着，林树巍串通一个理发匠，布置他在给黄士龙理发时把黄杀掉。由于理发匠胆小，临到给黄士龙理发时害怕起来，险些暴露机密。但林树巍、陆匡文坚持做新军工作，取得很大成效。新军标统（团长）饶景华、队官（连长）邹武、罗中流与林树巍密切来往，表示愿意支持革命。与此同时，派陆耀文、甘熙初到信宜团防局发展同盟会员，组织“选锋队”（敢死队）。“选锋队”不但有武器，而且又经过军事训练，有作战能力。决定起义时以这支队伍为主要武装力量。

在同盟会信宜分会的组织领导下，革命力量发展很快。正在形势顺利发展的时候，武昌起义爆发了。林云陔奉同盟会统筹部胡汉民、朱执信之命，担负领导光复高州的重任。他与林伯虎、陆嗣曾、陆幼刚等先赴香港领取枪弹、军饷，然后分别经江门赶回高州。在高州城“鸿渐馆”召开同盟会主要骨干会议，研究情况，分析形势，决定起义计划。宣誓要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和勇敢牺牲精神，务求起义完全成功。设起义总指挥部于文明门的冯屋。在林云陔的指挥下，兵分几路迅速向高州包围过来：由林树巍率信宜“选锋队”首先打响第一枪，从信宜出发急行军向高州城挺进；陆志云、陆师歧、梁卫平、梁禹平在广州湾（今湛江）郊区坡头运动民军开赴高州；陆耀文率领水东民军北上向高州进军；陆任宇、李拔萃、李肖精等在高州城内做好内应工作；梁树熊、陆匡文在总指挥部协助林云陔做好联络工作；调新军苏慎初和巡防营管带（营长）张锦芬和部分民军严密监视高雷道尹彭言孝（彭手中掌握数千清兵）行动。当各路武装部队包围高州城之后，林云陔亲自率领部队冲入高州府，清兵看见大势已去，纷纷缴械投降。起义军很快占领高州府道台衙门，宣布起义胜利。高州光复了。1911年11月13日，高州军政分府宣告成立，林云陔任分都督，梁树熊掌理民政，陆匡文掌理财政，苏慎初掌理军政。林云陔通令各县同盟会迅速组织起义，光复县城。黄士龙、彭言孝看到起义军势力强大，率新军和巡防营退逃广西，高州光复后，又把队伍拉回广东，退驻水东，由水东撤退，再回广州。从此高州所属6个县全境光复，高州起义取得预期的成功。

南路讨袁的中坚力量

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成果，篡夺了政权，派人刺杀国民党主要领袖宋教仁，签订善后大借款，妄图改制林帝。为推翻袁世凯，挽回辛亥革命的失败，1913年孙中山发动讨袁运动，“二次革命”开始。信宜县国民党分部长陆匡文会同

南路各县国民党分部长、各社团联合通电讨袁，动员各界人士以实际行动同袁世凯的篡权罪行进行坚决的斗争。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于1913年8月3日任命龙济光为广东都督兼民政长，并授予陆军上将衔。龙济光竭尽全力为袁世凯效劳，不惜一切手段镇压广东革命党人。

针对袁世凯、龙济光狼狈为奸的情况，邓铿（梅县人）、朱执信（番禺人）根据孙中山的意见，决定举行“三次革命”。朱执信将两阳四邑司令林树巍调任高雷司令，领导南路地区的讨袁倒龙运动。

在林树巍的指挥下，梁树熊与薛岳（乐昌人）、林直勉等人赴广州湾组织讨袁倒龙的武装力量。于广州湾赤坎，由李卓立出面租“长安店”设指挥机关，并以“南兴店”、“广怡华”杂货店作联络各地军政人员的联络站和招待所。派陆志云、梁禹平、李锡颐、谭惠泉（茂名人）、熊英（茂名人）等分别负责信宜、茂名、电白、化州、吴川等县讨袁倒龙运动的领导工作，广泛动员民众，加紧组织武装力量。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工作，林树巍率领革命党人和武装部队举行起义，迅速占领电白县。当讨袁运动取得初步胜利的关键时刻，龙济光的党羽、高雷道尹王典章突然照会广州湾法国租界政府，诬陷林树巍等革命党为土匪，行将抢劫广州湾，怂恿法驻广州湾当局派军警包围“长安店”和“广怡华”等机关，逮捕林树巍、梁树熊、梁卫平、陆师歧和薛岳、林直勉等8人。王典章还指使遂溪、吴川县长企图引渡林树巍等回高州加以杀害。在紧急关头，陆耀文赶赴澳门面报朱执信，由朱执信转报孙中山。孙中山即照会法政府提出抗议，加上广州湾赤坎商人潘葆光、翻译王镜秋等人联名报告法政府当局，证明林树巍等8人是孙中山革命派的革命党人。法政府将林树巍等8人解送越南河内，免遭杀害。王典章见此计不成，又利用革命党的变节分子李铁城为鹰犬，突然引兵搜索设在赤坎“南兴店”的机关，大肆镇压南路各县的革命党人。由于王典章的破坏，使南路各县革命党人准备起义的计划不能实施。结果，南路讨袁倒龙运动遭告失败。

孙中山在日本加紧倒袁的准备工作，不断派干部回国策划一系列反袁暴动。1915年12月2日派朱执信为中华革命军广东司令长官；1916年1月4日派陆任宇为高雷司令官，指挥高雷地区的讨袁运动。陆任宇接受孙中山的命令后，即与张发奎（始兴人）、李章达赴南路组织开展讨袁运动。先派陆志云、陆耀文、熊英（茂名人）等到广州湾赤坎，在李卓立的商店设讨袁指挥机关，开展与各县革命党人掌握的军队联络。后又派陆幼刚、陆匡文回信宜筹粮筹款，组织信宜革命党人起来参加讨袁运动。经过一系列准备工作后，陆任宇等赴化州，茂名指挥起义，率队经茂名西部的沙田向高州进发。后因袁世凯在高州的势力过大，未能攻入高州城。起义队伍向北前进，开入信宜，由信宜转两阳四邑。1916年5月9日，孙中山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陆任宇机据孙中山“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出于

国内”的号召，派梁树熊到广州继续筹办经费购买枪弹；派从越南释放回国的原高雷司令林树巍任讨袁司令部经理局局长，负责招收兵士和筹集军械，并负责组织训练工作。经过一个多月工作，已集中壮年近千人。正开始训练之际，传来袁世凯忧惧而死的消息。不久，孙中山即电告高雷司令陆任宇，暂停此项建军计划的实施。调陆任宇、林树巍回广州服务于大元帅府。

救护总统的忠勇义士

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组织第二次护法政府，就任大总统。当时，林树巍、陆志云、甘熙初、陆任宇等人在大本营工作，赖达在粤军（陈炯明部）任少校连长。

1922年在平定粤桂两省之后，孙中山为了打倒军阀，统一中国，重建共和，亲自率领大军，先后到桂林、韶关，督师北伐。大本营金库主任林云陔、度支处主任陆幼刚均随孙中山在北伐前线服务。当时担任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的陈炯明，北与北洋军阀吴佩孚、曹錕勾结，南同湖南省省长赵恒惕搞联省自治，阴谋破坏北伐，反对中国统一，处处给孙中山掣肘。起先令所部粤军五十个营从广西撤兵回粤，继则以辞去本兼各职为要挟，连使孙中山放弃北伐，叛逆之心日渐暴露。孙中山以团结为重，于1922年6月1日毅然从北伐前线韶关回到广州，以诚相见，教育陈炯明以革命为重，团结一致，共同对敌。

但陈炯明由于得到吴佩孚、曹錕的支持，妄图保持两广地盘作南面王，决定度动叛变，炮轰总统府，阴谋杀害孙中山。他于1922年6月13日下达密令，命叶举部占领广州东西北郊各战略要地，伺机进行叛变。这时赖达所在的陈炯明部陈德春第五独立旅奉命回驻广州。赖达沿途听到不少对孙中山不利的消息。他回到广州后，立即找到林树巍、陆志云、甘熙初、陆任宇，将不利于孙中山的消息见告。林树巍听到这一情报后，嘱赖达随时注意和了解陈炯明军的机密，及时向他报告。

1922年6月15日，林树巍约林直勉、陆志云、陆幼刚等人会集于广州东横街梁树熊的医馆内，交换情报，分析动态，研究应急对策，决定由林树巍、陆志云直接与赖达联络，切实掌握陈炯明的军事动态。是日晚上10时左右，赖达参加旅长陈德春召集的团、营、连长联席会议，得到军令。陈德春命其所属的第一团布防沙面、黄沙一带；第二团即时吃晚饭，全副武装开赴观音山脚与叶举部湘军李云复团互相配合，准予16日凌晨3时围攻总统府。赖达得这一准确的军事机密后，即刻设法秘密潜出，化装成富商，在陈塘找得两个妓女，拉妓乘车而过陈炯明部队的步哨，直接找到陆志云和林树巍，报告了紧急军事机密，并立即见总统府秘书林直勉。于是林直勉、林树巍、陆志云在当晚12时左右赶到孙中山驻地粤秀楼，把陈炯明已下达密令调动部队，决定立即发动叛变的特急军情向孙中山作详细报

告。陆志云说：“我有个在陈德春部队当连长的同乡名叫赖达，他向我报告了陈炯明叛变的确切机密情报。他说，陈军在今晚深夜3时开始攻击总统府，口号是‘食饱饭，杀民贼’，这个消息十分确实，情势很险恶。因此，请大总统连往别处，暂时避开。”孙中山听后说：“竟存（陈炯明）纵然恶劣，料不至此。即使竟存有不轨之谋，但他的部下有不少是明理正直的人，他们很多和我久共患难，岂肯尽听竟存之命？请各位无须过虑。”林树巍接着劝说：“粤军（指陈炯明军）素来野蛮，不能不防备。”劝孙中山离开粤秀楼。但孙中山表示不离开驻地粤秀楼。林直勉、林树巍、陆志云只好退出。由于事态发展越来越紧张，教孙中山的责任重大，林直勉、林树巍、陆志云又火速跑步去见孙中山，再三苦劝孙中山大总统要迅速离开此地。在千钧一发、最危急关头，他们拿白色夏布长衫给孙中山穿上，还给他戴上一副墨色眼镜，将孙中山化装成一个医生，然后强行扶扶孙中山离开粤秀楼，步行小路，经芒果街、连新街，走到惠爱路，正要横过马路入桂香街时，被陈炯明叛军哨兵拦阻，不准通过。哨兵盘问：“往何处去？干什么的！”林直勉指着孙中山对哨兵说：“我母亲患了重病，所以不得不深夜请来这位医生到家里诊治。”但哨兵仍不许通过。林树巍则说：“我们住在高第街，你们如若不信，就请一齐和我们到家里看看。”哨兵看见孙中山确象个医生模样，就让他们通过了。当林树巍等护送孙中山由马鞍街转小市街靖海路时，又遇到陈炯明叛军数百人，道路中有人力车十余辆，孙中山等四人态度从容镇定，分散从人力车中间穿过，叛军哨兵没有怀疑，便安然通过。从此则沿长堤走到海珠岸过，雇一小艇渡江往海珠海军司令部。海军哨兵盘问，林树巍回答，说是重要的公文必须亲交温总司令（温树德），温树德出来，见是孙中山，便请一同登楚豫舰。此时，炮声四起。速是陈炯明叛军洪兆麟部4千余人于16日凌晨3时，围攻总统府，炮轰粤秀楼的叛变行动。但大总统孙中山已安全脱险，转危为安了。登上楚豫舰后，即研究开展讨伐陈炯明叛军的战斗。

讨贼战争的得力后盾

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领导革命党人，组织大规模讨伐陈炯明（又称“讨贼”）的战争。在讨贼战争中，林树巍等人在军事上担负重任，不怕牺牲追随孙中山革命；林云陔等人则在财政经济上肩负重任，为争取讨贼战争的胜利而克服种种困难，筹集粮饷、武器装备，保证军需供应。

在讨伐战争初期，陆任宇、陆杰民、甘熙初等人奉命到陈炯明叛军中做秘密策反工作，因叛徒告密，被陈炯明杀害。后葬于广州市东沙路二望岗，人称“信宜四烈士墓”。

林树巍在讨贼战争中一直在第一线与叛军拼搏。1922年冬，林树巍担任高雷讨贼军总司令，离开总统府从广州出发，驰赴高雷，兴师讨贼，激战数月，把陈

炯明余部余汗脚数千之众打败，使高雷地区恢复和平。1923年12月，桂系军阀陆荣廷部申葆藩侵犯化州廉江等地，陆志云奉命从广州赶回高州协助林树巍率师征剿，申敌败退钦州。1924年春，陈炯明残部邓本殷、吕春荣等联合，以万余之众，竭尽全力进犯高雷。林树巍当时处在内无储粮、外无接济的极端困难条件下，抵抗邓本殷、吕春荣的进迫，坚守数月。1924年春，林树巍率部退至两阳四邑，继续开展讨贼战斗。同年10月22日，奉孙中山之命回广州大本营效劳。

在讨贼战争中，遇到一个大难题是军需供给紧张，常常遇到供不应求的情况。为解决军需供给问题，林云陔、陆幼刚、陆志云作出了贡献。在陈炯明叛变前夕，陆幼刚到广东省银行专访行长黄隆生，提出领取款项以应军需急用。但由于陈炯明派军需连日守捉现金收入，分文无存。根据这个情况，经反复磋商，说明是孙大总统指示要提取的。黄隆生行长只好将已签印尚未发出的小额省行券，拨解一部分，由银行沙面办事处交叶副官押送至宝璧舰，再转运讨贼军前线。接着，陆幼刚又赴广州湾与高雷各县长磋商，共同努力，结果筹集到一批粮饷，迅速将款项解送广州。林云陔在军饷紧缺的时刻，从讨贼战争前线几经辗转赶到上海向孙中山报告和请示解决军需问题。奉孙中山之命由上海直到香港筹款，经与香港爱国同胞和海外华侨讨论，很快筹集30余万巨款，亲自运回内地，由陆幼刚解遇到前线交东路讨贼军总司令许崇智，及时解决军需困难，支持讨贼战争顺利进展。

为了军需支出能够长期得以保证，为此孙中山对广东财政收入不佳的现状进行整顿。如两广盐运使所属的香安局，由于局长将放洲玩忽职守，挪用公款，抗缴税金，贪污腐败，以此抵制讨贼战争。孙中山作出改组香安局领导的决定，于1924年1月24日任命陆志云为香安局局长，撤销梅放洲职务。陆志云到职后，遵照孙大总统的部署，深入调查研究，迅速查清情况，将梅放洲的营私舞弊、违法乱纪，抗交公款等严重问题，直接报告孙大总统。孙中山据此即下达通缉令，通缉捉拿梅放洲归案严办，没收其营私的巨额款项。陆志云秉公执法，从而使香安局所管辖的财税收入大幅度增加，悉数上缴总统府金库，使讨贼军供给大为改善。这是当时广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财源。

此外，持续二年讨伐陈炯明的战争，还遇到广东与各驻军的电话通讯十分混乱，很不适应形势发展要求的严重问题。孙中山亲自过问此事，1924年7月8日决定任命政绩突出的香安局长陆志云为广东电话总局局长。陆志云到职后，雷厉风行，整顿了松、散、乱的局面。迅速制订出新的规率制度，并报大总统审批。由大总统通令各总司令、各军军长及其所属官兵，一律遵守执行新订的《广东电话总局规章制度》，从而使电话的管理制度，由军队到地方机关都带头执行，电话通讯系统的面貌为之一新，保证讨贼战争军事情况上遇下达，使指挥机关及时准确了解战况，大大有利于讨贼战争进行。

宣传革命的新闻尖兵

在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中，有不少进步文人在宣传革命、提高民众觉悟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信宜籍人李怀霜便是其中一个。

李怀霜是同盟会的老会员，也是进步文学团体“南社”成员，1910年3月，他与同盟会员夏重民邀请汉冶萍公司股东广东人陈芷澗出资，在上海租界望平街创办《天铎报》，李怀霜任总编辑。《天铎报》开始是以商业性报纸的面目出现，不久便积极宣传资产阶级革命，与于右任、宋教仁主办的《民立报》相呼应。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以“铁路国有”为名，将已归商办的川汉、粤汉干线的铁路建筑权出卖给英、法、德、美等帝国主义，激起一场“保路运动”。李怀霜主编的《天铎报》站在爱国主义立场，发表了青年文人陈布雷（后为蒋介石的近臣，幕僚长）致当时《中国新报》主编杨度的书信，明确表示：坚决反对清政府出卖中国经济利益的行径。同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响应。帝国主义侵略者却把军舰开进长江，企图干涉这场资产阶级革命。当时，在帝国主义势力很强的上海，许多报刊仍对武昌起义持反对态度，把革命军称作“逆军”，把起义的革命行动称作“叛乱”。李怀霜主编的《天铎报》则以《谈鄂》为题，连续发表十篇评论，旗帜鲜明地支持武昌起义，支持各省纷纷响应的革命行动。这十篇时事评论连续刊出之后，不啻晨钟暮鼓之轰鸣，震聋发聩，对革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刚刚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于1912年1月4日用英文写出《对外宣言》，派外交总长王宠惠专程从南京带到上海，交李怀霜主编的《天铎报》译成中文，《天铎报》于1912年1月5日独家首先发表，顿时声震寰宇。1912年3月，袁世凯篡权窃国之后，李怀霜主编的《天铎报》连续刊登大量宣传民主革命文章，宣传“二次革命”，对袁世凯的窃国罪行作针锋相对的坚决斗争。宋教仁被暗杀于上海，李怀霜坚持正义，不怕风险，写下了《宋钝初先生谋并叙》，高度赞扬了宋教仁的业绩，表示了自己坚持革命的决心：“君骨可朽，吾头可断，此恨不遂泯也。”“先生往矣，国命如何？草草伊发，历历楚歌。吾种不忘，朽腐其芽。”激愤之情，溢于行间。袁世凯对李怀霜和《天铎报》的反袁言论又怕又恨，于1913年8月25日下令封禁了《天铎报》，李怀霜被迫出走海外。

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并亲任大元帅。为了从舆论上大力支持孙中山的护法政府，宣传孙中山的革命斗争，于是年冬，李怀霜请老同盟会员甄亮甫与陆军部次长崔文藻出资创办《珠江日报》，李怀霜任总编辑，继续为孙中山的民主主义革命大造舆论。在他的主持下，《珠江日报》积极宣传民主革命，公开揭露那些对抗孙中山军政府的军阀行径。1918年4月，政学系头目李权源勾结桂系军阀莫荣新，排挤孙中山反孙中山革命派，囚禁了军政府陆军部长张开儒，杀害了陆军部次长崔文藻。李怀霜以《珠江日报》为阵地，旗帜鲜明地公